



歷

史 / 滄海叢刊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臺灣史與臺灣人

王曉波 著



1112
N702
231

臺 灣 與 史 灣 臺

著 波 晓 王



滄海叢刊

1988

東 大 圖 書 公 司 印 行

◎ 臺灣史與臺灣人

1.臺灣一歷史一日據時期（1895—1945）

2.臺灣

—歷史—光復以後（1945—）

I.

王曉波著

673.228/8466

作者

王曉波

發行人

劉仲文

出版者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

編號

E 76006

基本定價

肆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臺灣史研究的自我告白

——《臺灣史與臺灣人》自序

這本《臺灣史與臺灣人》是我研究臺灣史以來，集結出版的第八本書了。此前，我編過《臺胞抗日文獻選編》、《臺灣的殖民地傷痕》及以「臺灣史研究會」的名義出版《王敏川選集》，和一本未具名而被警總查禁的《二二八真相》；另外，還出版了《臺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運動》、《走出臺灣歷史的陰影》、《被顛倒的臺灣歷史》。

在這本《臺灣史與臺灣人》出版之前，我想把自己從事臺灣史研究的心路歷程作一次告白。

我是五歲隨家父的部隊來臺的，時一九四八年，正是「二二八事件」的第二年。一九五一年，家母以政治的理由被處決，家父遭牽連處刑七年，親戚亦不敢往來。外祖母帶著我們兄妹四人，小妹未滿週年，整個家庭陷入絕境，連三餐亦無以爲繼。我和大妹則成爲臺中育幼院的院外院童，全家的「固定收入」就是這麼一點臺中育幼院的救濟金，另外就是父親舊屬的一些救濟，甚至我們兄妹被迫不得不到市場的垃圾堆裏覓食。

雖然，我們只過著動物起碼的生活，但是，在學校裏，卻被臺籍同學仇視爲「外省郎」，被罵成「山豬」。這當然是，「二二八事件」後，本省同胞的反抗意志被鎮壓了，而將怨毒之氣在家中感染給孩子們，而有我在學校所受到的「外省郎」的仇視。

另外一方面，我們被甩出了「外省郎」的圈子後，在臺中的北屯鄉下，和本省的基層民眾生活在一起，卻也相濡以沫，受到本省鄰居們的種種照顧。逢年過節，外婆和我們兄妹，一家五口瑟縮在家吃著從市場撿回來的菜梗時，總是有好心的鄰居送來拜拜過的鷄鴨鵝肉，其美味是我終身不忘的，也是我終身感激的。

我是和本省孩子一起在臺灣的泥巴地裏打滾長大的，我從來沒有「外省郎」的優越感，也從來不自認應有統治階級的「罪惡感」。我的出生和家世也都不是我自由意志的選擇。

二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在臺大的校園範圍內，爆發了一場「民族主義論戰」，緣起於「保釣運動」後，校園內民族主義高漲，引起了某些人的疑慮，所謂「民族主義進，共產主義出」，即認爲民族主義是有利於中共的。學生中也發生思想的分歧，而有「大學論壇」社所舉辦的二次「民族主義座談會」。我也是受邀請的人之一，而成爲論戰中被攻擊的對象。

我之所以受攻擊的理由有二點：一是堅持反對帝國主義而主張民族主義，因此我雖不贊成「義和團」運動，但肯定其反帝精神；二是在瀰漫著「中國統一＝中共統治」的氣氛下，我提出了

三民主義統一論，打破了「中國統一＝中共統治」的「假統一」和「真臺獨」的公式框架。

茲將當時對我的攻擊摘要抄錄如下，以便「溫故知新」——

「在一片反常的聲浪中，以陳鼓應、王曉波二先生的口號最為響亮，態度最為壯壯，聲勢也最為奪人。然而王曉波先生的『不知所云』『言之無物』聽起來頗令人痛心，以時下臺灣的高級知識份子，竟作如是表現的確令人愕惋。愕惋之餘，不得不對臺灣知識界作一通盤之檢討，檢討之下，才發現一股『義和團』的歪風已逐漸漫延。

然而今日之義和團的確有異於昔日義和團之處，這也就是王曉波先生對於『義和團』這頂帽子受之不恭的主要緣故吧？筆者以為王先生之所以不能認同於牛鬼蛇神的拳民處有二：（一）、王先生受過研究所以上的教育，擁有較高的知識與較高的社會地位。（二）、王先生以『三民主義』代替了昔日的護身符。這或許是王先生謂為進步之處也未可知哩！

然而王曉波先生與義和團不識時務上則同，情緒用事上亦同，盲目排外上更無何不同。擁抱『三民主義』挾天予以令諸侯，這種態度不但對三民主義是一種污蔑，對孫中山先生更是一種不敬。不管王先生的『居心何在』，這種方式實有待商榷。」

「民族主義，在從前，是就統一而完整的中國而言的；由於當時只有一個府，所以並不造成扞格。然而，當時的國府現在正在臺灣（並且是這次參加論戰雙方公認的唯一合法政府），他的『最大』敵人是竊據大陸的共匪，而共匪也在高談民族主義。因此，

今天我們要談民族主義，必先求民族統一，要求民族統一，必先消滅共匪。我不知道共匪未消滅還有什麼民族統一可言？民族未統一，還有什麼民族主義可言？

或許有人會說談論民族主義可以不關『消滅共匪』，那麼，我必須告訴你，共匪正打算消滅我們。或許有人會再說談論民族主義只是在民族同胞間造成情感交流，與政府無關，那麼，我必須再告訴你，那些你想造成情感交流的『同胞』正隨時可能在共匪的一聲號令下血洗臺灣；同時在世界各處默默進行孤立我們打擊我們的也正是這些『苦難同胞』。對於敵對雙方，勉強把『同胞』和『國家』分開來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你的同胞愛真是這麼發達的話，那麼，我可以保證，在你放下武器『哈囉』的時候，也正是這些『同胞』開槍射殺你的時候。」

「舉一個淺顯的例子來說：北美十三洲和英國是同文同種的民族，然而由於實際利益的衝突，終於導致彼此政治的分裂，美國固然獨立了，而『英國的』文化也無法作為解消分裂的工具，甚至，在獨立一百年後，美國還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文化。（當然，在可能的範圍內，沒有人阻止他們造成彼此『文化交流』或『情感交流』的機會。）

這個例子說明了國家先於民族的事實；對於獨立的美國而言，傳統英國式的民族主義已經不具任何意涵。」

「當然，王曉波也可以從他自認的『非士大夫和白人價值中心的立場』來否定這段

歷史，來『美化義和團』，爲他心目中的『勇士們伸冤』。但本人要正告他一句：既然你『從未閱讀和研究過共產主義理論的經典』，那麼你也不會知道，你所說的這套正是大陸共匪用來煽惑『民族情緒』的那套，他們的居心叵測；在他們一片『反壓迫、爭自由』的呼聲中，徒然增加了不少無謂的仇恨和無辜的罪名。本人不希望此時此地一個真正『反壓迫、爭自由』的知識份子，有和他們巧合的論調。』

(1) 對「義和團」反帝國主義精神的肯定，並不始於我，也不始於「共匪」，而是始於孫中山的〈九七國恥宣言〉。

(2) 我之所以會受到這麼猛烈的攻擊，正是《大學新聞》（三八三期）所言：「當國外的留學生正在受所謂『統一運動』和『獨立運動』等分解思想的干擾和宣傳時，此時，能適時地舉辦一個民族主義座談會，使在臺灣的大學生能對目前的國家處境有了深切檢討和了解的機會，這可以說是一個明確而令人振奮的事情。尤其，中央黨部海外工作會主任陳裕清先生亦不辭勞苦的出席參加，更顯示出了政府當局對此問題的重視。」

(3) 所以，這次「民族主義論戰」，是光復後島內第一次的「統獨論戰」，並且，一上來就是反共法西斯加上分離主義的，也是今日「臺獨法西斯」的濫觴。

三

論戰一起，雖然被攻擊的對象是陳鼓應和我，但學生們卻也迅速的分成了兩個陣營，在臺大

的刊物上「你來我往」。從十二月初到翌年元月中旬，學校放寒假，而自然停止。到了二月中旬，學校註冊的前夕，開始傳出，參加論戰而支持民族主義的學生陸續被捕，至二月十七日（是年元宵節），陳鼓應與我亦被捕約談。

雖然，我們都在約談後被釋回，但七三年秋，陳鼓應即被臺大解聘；七四年，我和趙天儀等八位臺大哲學系的教師又被解聘，是為轟動一時的「臺大哲學系事件」。

我的專業是中國哲學研究，而非臺灣史研究，至今仍不敢以臺灣史學者自居，我研究臺灣史在「民族主義論戰」之後，拙著《臺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運動》的自序中曾有交代說：

「但使得一個不以臺灣史為專業的人，卻以臺灣史為題材，作了幾十萬字的寫作，

那應該導因於一九七二年底至一九七三年初的『臺大民族主義論戰』，那時有一些自稱擁有『西方自由民主』的人，又以『臺灣人』自居，卻曲意為帝國主義張目，而視民族主義為義和團。因此，我決心要在臺灣先人的奮鬥史中，來尋求臺灣歷史的方向。再經過對西方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研究，發現民族主義不但是近代西方國家發展的思潮，並且在政治思想史上將『朕即國家』轉化成『主權在民』。對外沒有獨立主權，對內沒有『主權在民』，都不可能建立民主政治的。在日據下的臺灣先人，要有政治的民主，必先有獨立的主權，但臺灣主權屬於異民族的日本，故日據下臺灣的民主運動必以民族鬪爭和民族解放為先決條件。這也就是說，民族運動的成功乃是民主運動成功的必要條

件。環顧人類近代的歷史，尤其是當代的第三世界運動，我們實在找不到有反民族主義

的真正民主運動。」

十六年來，當時以我「三民主義統一論」爲「與匪唱和」的國民黨，居然在其十三全大會通過陳立夫等提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寄生在臺灣民主運動中的臺獨，也愈來愈暴露其反民主的法西斯面目，竟連草根民主的地方領袖黃信介也被臺獨扣上了「秘密勾結中共，出賣臺灣」的罪名。這又豈是偶然？

根據我十幾年來的研究，臺獨的成因誠然錯綜複雜，與日據時代的「皇民化」有關，與光復初期的「二二八事件」有關，與四十年來的海峽隔絕有關，與四十年來國共兩黨在兩岸的統治令人失望有關，更重要的是與美國對臺政策有關。所以，在以往的臺灣歷史上，雖以臺民難治爲稱，或謂「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但卻無仇視、鄙視中華民族之分離主義。因此，臺獨或「臺獨意識」實爲臺灣歷史的「異化」。

臺灣史研究始於連橫之《臺灣通史》，其在自序中言：「古人有言：『國可滅，而史不可滅』。是以鄧書燕說，猶存其名，晉乘楚杌，語多可採。然則臺灣無史，豈非臺人之痛歟？」雅堂先生懷亡國之痛而著史之情躍然紙上。在今天各種分離主義雜陳肆虐之際，而寫作臺灣史，又豈能無雅堂先生當年之痛乎？尤其像我這樣的一個第二代「外省郎」，其處境之艱難猶甚於雅堂先生了。

四

本書所收集的文章，除了對臺灣史的意義和事件的論述外，對臺灣歷史人物的論述也佔相當的部分。例如，〈日據時期「臺灣派」的祖國意識〉主要是寫林獻堂，另外有寫李友邦、王敏川、張慶漳、王文明等文，還有目前還健在的陳其昌和巫永福。陳映真雖尚春秋鼎盛，然其亦必將成為臺灣歷史的人物，故一併列入。還有一位外省的臺灣人尹章義教授，他是只寫別人歷史的歷史學教授，至於他自己的歷史只好我幫他寫一篇了。

所以，本書題爲《臺灣史與臺灣人》。是爲之序。

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于新店



王曉波，一九四三年生，貴州省遵义縣人，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曾任臺灣大學哲學系講師、中國大陸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現任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中國哲學學會監事、臺灣史研究會理事長。著有：《先秦儒家社會哲學研究》、《儒法思想論集》、《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Han Fei's Political Theory》、《哲學與思想》、《走出臺灣歷史的陰影》、《被顛倒的臺灣歷史》、《臺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運動》、《臺灣人》等書。編撰有：《現代中國思想家孫中山》、《孫中山選集》、《臺胞抗日文獻選編》、《臺灣的殖民地傷痕》、《王敏川選集》、《二二八真相》等。並著有相關之評論文集多部。

內容簡介

「沒有哲學的歷史是盲目的，沒有歷史的哲學是空洞的」，哲學教授王曉波寫作的臺灣史中，是既有歷史，又有哲學的臺灣史。

地方志本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由於近代臺灣史的特殊性，而使得臺灣史的寫作與其他中國各地方志不同。在日據時代，連雅堂懷抱着亡國之痛，而有《臺灣通史》之作，開始了臺灣史研究的先河。光復不久後的臺灣，又遭遇了中國分裂的局面至今，王曉波教授是懷抱祖國分裂之痛來從事臺灣史的研究。

在王曉波教授的臺灣史研究中，臺灣是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原點」，也是中國人民八年抗戰的「原史」，但却在光復後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本書收集的是從日據時代以後的臺灣近現代史的論述。

臺灣史與臺灣人

目 錄

自序

一、中國人民對日抗戰的「原史」

——論臺胞抗日史的意義

二、日據時期「臺灣派」的祖國意識

三、臺胞抗日民族運動的合與分

——講於「紀念民衆黨成立六十週年座談會」

四、李友邦與臺灣義勇隊初探

六九

五、「三二八事件」在臺灣現代史的透視

八一
一一三

目 錄

六、歷史問題必須歷史解決.....「三一」

——「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論其與共產黨之關係

七、走出「二二八」的陰影.....「五七」

——與日本記者談「二二八事件」

八、在黑暗時期的歷史上.....「六九」

——「出版法」的制訂及其經過

九、戰後臺獨運動與兩岸關係之前景.....「一〇一」

——講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

十、作臺灣歷史的干城.....「三一」

——評介尹著《臺灣近代史論》

十一、臺灣最後的河洛人.....「三九」

——巫著《風雨中的長青樹》讀後感

十二、臺灣人靈魂的重建者.....「五五」

——論陳映真中國立場的歷史背景

十三、悲涼而雄壯的聲音 ······

二七三

——記陳其昌先生及《遠望雜誌》創刊

十四、敢將此心向日月 ······

二八一

——序《王敏川選集》

附錄(一)：彰化縣政府致臺灣史研究會函

附錄(二)：臺灣史研究會覆彰化縣政府函

十五、敢抗日寇竟留遺憾 ······

二九九

——敬悼臺灣抗日志士王文明先生

十六、平反冤抑以慰生靈 ······

三〇九

——敬悼張慶漳先生

目

一、中國人民對日抗戰的「原史」

——論臺胞抗日史的意義

民族自救運動的「原點」

從一八四〇年以來，「鴉片戰爭」失敗，「天朝上國」逐漸淪爲西方帝國主義的俎上之肉，有識之士也漸漸認識到非變革無以圖強，而有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這時候的孫中山，其實還是「體制內改革」，是一種改良主義，並非「革命派」。

一直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後，孫中山才毅然於該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開始，也是近代中國革命運動的開始，而其宣言中即言：「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命，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憤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